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孙伟◎著

# “道”与“幸福”

## 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孙 伟 ◎ 著

# “道” 与 “幸福”

## 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与“幸福”：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比较研究/孙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

ISBN 978 - 7 - 301 - 25354 - 0

I. ①道… II. ①孙… III. ①荀况（前313～前238）—伦理学—思想评论 ②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伦理学—思想评论 ③比较伦理学—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B222.65 ②B502.233 ③B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5581号

**书 名** “道”与“幸福”：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比较研究

**著作责任者** 孙 伟 著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5354 - 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子 信 箱** weidf02@sina.com

**新 浪 微 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印 刷 者**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5.25印张 234千字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尽管荀子对形而上学和科学缺乏兴趣，而后者正是古希腊马其顿人的标志，但他有一种发展和系统化儒家哲学的能力，这使得儒家哲学直到他的时代才成为一套权威的学术体系，这使得他和古希腊的同时代人非常接近。荀子在经验基础上的分析显示了他对心理学的兴趣……对儒家哲学来说，他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得儒家哲学具有牢固的根基，最终在帝国时代将其树立为权威的学说。<sup>①</sup>

—Homer H. Dubs

---

<sup>①</sup> Dubs, H. H., *Hsuntze: 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27, p. xix.

## 序 言

### 道与幸福：对荀子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比较

在当前对于跨文化比较哲学不断上升的热潮中,对于古希腊哲学和儒家伦理学的比较已经非常普遍。这些研究大多数将二者的伦理学诠释为德性伦理学,并且通常聚焦于《论语》和《孟子》的文本。孙伟这部关于比较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将是一个创新性的尝试,有望在比较哲学领域开辟新的天地并且确定新的研究方向。尽管这部著作处于德性伦理学的框架之中,它还是区别于先前对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的比较,因为这部著作不是强调伦理生活的构成性方式(德性),而是它最终的目的——在中国哲学中是“道”,在希腊哲学中是“幸福”。这部著作也超越了德性伦理学的范围,开始关注东西方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并探索东西方哲学中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关联。

这部专著将会为赞同南乐山(Robert Neville)教授观点的人所欢迎,因为南教授认为在对于中国哲学的讨论中,荀子值得加以更多地关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反对将荀子排除在儒家正统之外的做法,或者只是关注于他的哲学而不去探讨荀子在儒家传统中的地位。然而,很少有学者像孙伟这样作了如此之丰富的研究来证明荀子是一个儒家并且对儒家学说的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部专著对于荀子哲学的阐释是在孙伟之前一部著作基础上的继续推进。正像他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置于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背景之中,并且对柏拉图给予特别的关注,他也同样将荀子哲学置于孔子和孟子的教义背景之中。尽管这部书的重点是亚里士多德和荀子,但比较的范围更加宽广,它将对亚里士多德和荀子产生重要影响的其他古希腊思想家和中国的哲学家也考虑在内,后者的观点则与比较的主题息息相关。

受到近来哲学中“方法论转向”的影响,孙伟在著作一开始就适时提出

了他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主要引入了牟博教授所提出的“建构性参与”途径。像每一位从事比较哲学的学者一样,孙伟相信,尽管东西方哲学间有着显著的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但它们之间的比较是可能的,并且这种比较将有助于解决哲学问题。书中有一章专门探讨了东西方的历史与文化差异,详细分析了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知识文化传统,这就为亚里士多德和荀子的哲学提供了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一章对于古希腊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的介绍对那些不熟悉它们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引言。

由于对伦理行为的渴求与作为人类幸福一部分的对世间物质名利的欲望二者的冲突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对于“道”和“幸福”的选择就与当今我们的生活高度相关。尽管每种传统——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儒家学派——都有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但对于二者的比较将会更有启发性意义。一些学者或许会反对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假定了形而上学或至少是元伦理学的目的论,而这与早期儒家彻底内在的伦理性价值观不相容。其他学者也许会怀疑它们二者的道德心理学是否具有足够的相似性来进行可行性比较。一些学者也许会质疑“天人合一”是否是一种对荀子“道”的适当描述,如果我们允许对这一观念进行不同界定的话。还有一些人或许会反对将儒家的礼等同于希腊思想中的理性或理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各种不同的诠释观点和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也会有读者们愿意赞同儒家在追求“道”的过程中是在追求某些绝对的永恒真理。

这本专著为伦理生活提供了有趣的观察角度,比如从人性到神性的转变(其中包含了对思辨或“大清明”二者在更高程度上的实现)就增强了现实世界伦理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性。孙伟强调了在“大清明”和在日常普通生活之中追寻儒家之道之间的连续性,而这就为解决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理智生活和实践/政治生活关系的争论提供了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或许未必能说服那些认为亚里士多德道德心理学中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隔阂和无法解决的张力的学者。然而,它对于如何在伦理生活中包含精神维度的同时而不失去其实践性方面,仍然是一种饶有兴趣的思考。

我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去发现这部著作中许多有趣的论断吧。最后,我

要衷心祝贺孙伟用他的勇气和努力完成了这样一项宏伟的研究,并希望这部著作能够在未来引领更多关于荀子和亚里士多德富有成效的比较研究,以及其他关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的比较。

陈素芬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4 年 2 月 18 日

# 目 录

|                                |       |
|--------------------------------|-------|
| 导论 .....                       | (1)   |
| 比较如何可能? ——一种关于比较哲学方法论的探讨 ..... | (1)   |
| 第一章 思想的历史与传统的革新 .....          | (6)   |
| 一、古希腊时期的思想文化传统 .....           | (6)   |
| 二、春秋和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传统 .....         | (33)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哲学的“道”论传统 .....        | (52)  |
| 一、道家之“道” .....                 | (52)  |
| 二、儒家之“道” .....                 | (60)  |
| 第三章 古希腊的“幸福”理论 .....           | (67)  |
| 一、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幸福”论 .....         | (68)  |
| 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 .....            | (74)  |
| 第四章 “道”与“幸福” .....             | (81)  |
| 一、“大清明”与“道” .....              | (83)  |
| 二、“道”与“幸福”的层级 .....            | (91)  |
| 三、“荣”“辱”之间:“道”与“幸福”的验证 .....   | (102) |
| 第五章 从人性到神性 .....               | (112) |
| 一、古希腊的理性人性观 .....              | (112) |
| 二、先秦儒家的道德心性观 .....             | (121) |
| 三、实践智慧与“义” .....               | (157) |
| 四、伦理德性与“礼” .....               | (166) |

|                            |       |
|----------------------------|-------|
| 第六章 “法”与“道” .....          | (171) |
| 一、荀子的“法” .....             | (171) |
| 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观 .....          | (177) |
| 三、“法”与“情” .....            | (188) |
| 四、“先王”与“后王”:传统与当下的统一 ..... | (194) |
| 五、王道与霸政 .....              | (204) |
| 结语 .....                   | (221) |
| 后记 .....                   | (229) |
| 参考文献 .....                 | (231) |

# 导 论

“道”与“幸福”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对人类整体生活所设定的最高目的。就人类的整体生活而言,一方面实现“道”或“幸福”的活动是人类自身伦理建设的核心内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道”和“幸福”的诸多复杂属性,也导致了人们对这两个术语的误解或误读。本书旨在从荀子的“道”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入手,分析二者何以成为各自伦理传统中的核心概念,并深入探讨二者如何互为借鉴,共同提供一种对于德性和人的道德完善途径的全面理解。

## 比较如何可能?——一种关于比较哲学方法论的探讨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有关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问题,其中贯穿始终的是对于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文本的深入比较分析。然而,就这种比较本身而言,可能会有不少学者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由于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是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知识背景下的两个思想家,对他们思想的比较是可能的吗?我们知道,思想往往是当时历史时代以及知识背景的产物,而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知识背景都不尽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如何具有可比性?退一步来说,如果能够进行比较的话,这种比较的意义何在?我想上述问题不仅是本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比较哲学本身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下面笔者将详细考察比较哲学的本质及其所使用的方法论问题。

美国华裔哲学家牟博先生在他主编的《比较哲学》创刊号中对比较哲学的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

比较哲学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目标和方法论策略,简而言之,就

是要探寻怎样通过反思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来自不同哲学传统或以不同风格/导向从事哲学研究(在一种传统中或在不同传统中)的不同思维方式、方法论途径、视界、洞见、重要观点或概念性以及解释性资源,能够从彼此相互学习,共同为一系列具有重要哲学意义的议题、主题或话题的理解和论述共同作出贡献,而所有这些议题或主题可以通过适当的哲学阐释和从更广阔的哲学视角来共同加以关注。<sup>①</sup>

这也就是说,比较哲学关注于不同哲学传统或思想传统的比较,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某些哲学问题或创建新的哲学观点。但这一目的如何能够保证比较的有效性呢?来自于不同哲学传统或思想传统的观点,如何具有可比性?牟博认为,无论东西方哲学如何不同,它们在哲学问题上的关注则是一致的。就某一个哲学问题而言,无论它们所使用的语言如何不同,或者表达方式如何不同,但都是在表述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所以,在探讨某个哲学问题的层面上,我们是可以将东西方哲学的思想来加以比较的。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要注意避免的倾向是对不同思想家观点以及文本的单纯历史性的描述或者只是对其相似性或不同点的简单对比,而忽略了对不同思想的哲学比较与阐释。<sup>②</sup> 唯有对哲学问题的具体深入分析和比较,才能使得阐释者能够对思想家本身的观点和其隐含的观点进行深入探讨,而思想家的这些观点本身也许并没有明确地被这个思想家自己考虑过,或者阐释者本身能够用一种更加哲学或者更加清晰和连贯的方式来对思想家的观点进行呈现。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另外一个传统的概念或者解释性资源就会有助于我们对思想家观点或文本的理解。<sup>③</sup>

牟博接着指出了这一比较过程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参与阶段(pre-engagement phase)。这一阶段主要是思考关于某个哲学问题的来自不同思想传统的观点;第二阶段是参与阶段(engagement phase)。在这一阶段,这些观点都内在地参与进来,共同为解决某一哲学问题提供自己的见

① Bo Mou, "On Constructive-Engagement Strate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 Journal of Theme Introduction", in Bo Mou ed.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ume 1, No. 1, 2010, p. 3.

② Ibid., p. 5.

③ Ibid., p. 14.

解;第三阶段则是后参与阶段(post-engagement phase),在这一阶段,不同传统的观点被吸收成为解决某个哲学问题的新路径。

就第一阶段而言,我们需要用一种普遍的哲学视角从某种思想传统中抽取或剥离出一些哲学观念,而不去涉及这一观念所产生的传统或背景中的无关因素,尽管后者可能会对理解这些观念有所帮助。这样做的理由在于:首先,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研究一个观念如何与其思想传统或背景之间的联系,而是这个观念如何与我们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相关。其次,尽管我们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之中来理解某个观念,但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个观念的意义之后,我们就没有继续探讨背景的必要性了。再次,这种比较研究方法并不否认某种观念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但问题在于这种观念和社会历史背景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比较哲学中对其进行深入表述。

在第二阶段,来自不同思想传统的相关视角或观点进行建构性地参与。从某一方的观点出发,另外一方的观点是外在的;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哲学视角或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来说,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彼此互补。在这一语境中,“外在”这个术语就会忽略了我们的目的。这里的关键点不是这个或那个独立的视角,而是所有这些视角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这些视角都能够成为一个当前哲学议题中的内在的、能够互补的组成部分。

在最后一个阶段,要进行的工作就是对不同的视角和观点进行调整、模糊并且吸收,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进路。这才是我们想在比较哲学中看到的東西。<sup>①</sup>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牟博关于比较哲学方法论的观点。首先,本书要进行比较的是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毋庸置疑,荀子和亚里士多德虽然在生活的时间上相隔并不很长而基本上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荀子生于约公元前313年,卒于前238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前384年,卒于前322年),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都是极为不同的。荀子生活在中国古代的战国中后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分裂成七个较大的诸

---

<sup>①</sup> Bo Mou, "On Constructive-Engagement Strate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 Journal of Theme Introduction", in Bo Mou ed.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ume 1, No. 1, 2010, p. 18.

侯国,彼此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亚里士多德则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古希腊的雅典,而雅典虽然在当时处于马其顿王国的统治之下,并不时会有反抗马其顿统治的战争爆发,但最终雅典都还是处在马其顿王国尤其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之下,可以说是一个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时代。荀子所生活的战国中后期充斥着各家学派的学说和主张,其中既有儒家、道家,也有法家、名家、阴阳家以及纵横家,而荀子的思想可以说是以儒家为主,兼收其他学派有助于发展儒家学派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则主要作为柏拉图学园的学生来跟随自己的老师柏拉图学习,这就意味着他的哲学思想必然带有古希腊哲学由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传承下来的印迹,而其所处的知识背景也并不像战国时代那样“百家争鸣”,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单纯性。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在比较二者的伦理学思想时兼顾探讨其产生的历史或知识背景,那将会是一种极其繁琐的工作,而且可能会由于这种历史性的回顾而忽略了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所在,那就是二者伦理学中的某些共同哲学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尽量少地介绍二者所生活的历史时代背景,而尽可能多地将篇幅留给哲学问题的探讨。

其次,我们要将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进行比较的意义在于发现二者思想中能够为解决某些哲学问题提供的途径。西方学界一直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的“幸福”概念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乃是指各种德性实践活动所能达到的圆满状态,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主张“幸福”是一种纯粹的思辨活动。究竟两种观点孰对孰错?或者,如果二者都说出了部分真理的话,那二者又是如何能够互相兼容共处的呢?把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诉诸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文本本身恐怕并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前几章一直说“幸福”是一种德性的实践活动,而在最后一章又突然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幸福”乃是一种纯粹的思辨活动。如果就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本身而言,这两种观点似乎都应该被认为是“幸福”的一种定义。但这两种定义如果都是正确的话,如何能够做到互相兼容呢?这时候,我们通过审视荀子伦理学中的相关概念——“道”,也许会得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荀子伦理学中,“道”的实现既在于德性的实践活动,而其本质的实现更在于“虚一而静”所实现的“大清明”状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道”的这两种含义的

相互兼容或许会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两种定义的争论提供一种解决的路径。同样的,亚里士多德对于法律和人性教化之间关系的观点也能够为荀子对于法律的坚持乃是为了实现儒家关于人性的理想的观点提供一种有力的辩护。因此,这种对于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间的比较是为了发现一种解决彼此伦理学之中某些问题的途径。或者用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的话,是为了对某个共同的哲学问题——比如说幸福和道这一伦理学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或解决思路。

然而,对于牟博所提到的比较哲学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对不同的视角和观点进行调整、模糊并且吸收,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进路,笔者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虽然都可以从彼此双方借鉴很多观点来为自身的哲学形成一种外来的补充和辩护,并且二者伦理学发展的进程和目标(详见第五章最后一个部分)都有相当程度的类似,但对于是否需要最后将二者观点加以模糊并且调整吸收为一个观点,则是有疑问的。虽然二者观点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对于二者差异观点的模糊似乎也并无必要,因为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二者比较的价值和意义,而二者的差异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某一哲学问题的回答。

基于上述的研究方法,本书对于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也大体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分别对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在这个部分中,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概念在各自学术传统中的沿承将会被详加探讨。第二个部分是对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伦理学概念进行“建构性地参与”。在这一部分,将主要探讨荀子的伦理学将如何能够为解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难题提供一种路径。同时,也将探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将如何能够为荀子伦理学中的某些问题提供一种辩护。第三个部分将会探讨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这种“建构性参与”如何为某种普遍的哲学问题或终极关怀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这一部分,将主要探讨德性伦理学所关注的最终目的——人的德性培养和塑造,是如何与伦理学乃至人生的最终目的——“幸福”或“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如何在纯粹的思辨活动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 第一章 思想的历史与传统的革新

## 一、古希腊时期的思想文化传统

为了更加准确和深刻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我们必须将历史的景深推得更远一些。在本节中,我们将会把观察的视角推向古希腊哲学诞生以前的历史时代,探讨古希腊时期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及这些传统与古希腊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于古希腊哲学的起源问题,西方学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有相当多学者认为,希腊文化乃至哲学都是在西亚和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

埃及人在人类中第一个想出用太阳年来计时的方法,并且将一年分成十二部分。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是从星辰得到这种知识的。在我看来,他们计年的方法要比希腊人的办法高明,因为希腊人每隔一年就要插进去一个闰月才能使季节吻合,但是埃及人把一年分成各有三十天的十二个月,此外再加五天,这样,季节的循环就和历法吻合了。他们又说,埃及人最初使用了十二位神的名字,这些名字后来被希腊人借用了去。<sup>①</sup>

希罗多德认为,埃及的宗教神话和灵魂观念对古希腊人的宗教和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

在埃及,人们相信地下世界的统治者是戴美特尔和狄奥尼索斯。此外,埃及人还第一个教给人们说,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而在肉体死

---

<sup>①</sup>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0—111页。

去的时候,人的灵魂便进到当时正在生下来的其他生物里面去;而在经过陆、海、空三界的一切生物之后,这灵魂便再一次投生到人体里面来。这整个的一次循环要在三千年中间完成。早先和后来的一些希腊人也采用过这个说法,就好像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样。<sup>①</sup>

德国古典学者耶格尔(Werner Jaeger)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早期希腊哲学家的神学》一书中说:

公元前六世纪,米利都达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人们可以看到,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贸易、艺术和技术方面同东方古老的文化显然有密切的关系;东方文化对希腊精神发展的影响究竟达到什么地步,历来就有争议。不难想象,东方创造的各式各样的神话、巴比伦的占星术对于易受影响的希腊人的心灵,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sup>②</sup>

这样,主张古希腊哲学受到西亚和埃及文化影响的观点一直盛行于西方学界。但也有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策勒尔就是其中一人。策勒尔在他关于古希腊哲学的起源问题上,详细探讨了当时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几种看法。

策勒尔认为,大约在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时期之后,就普遍流行着这样的看法,即大多数重要的古希腊哲学家都曾被东方的僧侣和贤人教导过,因而他们的思想很明显就来自于这一起源。这一观点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逐渐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看法,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将其发展到了极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自东方的概念对希腊哲学的影响甚至被那些认为哲学纯粹就是希腊人自己创造的学者所承认。希腊人,就像是其他印度—日耳曼语系的种族一样,兴起于亚洲,从这个最早的家园他们承载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以及习俗等等。当希腊人到达他们后来的居住地后,他们也仍然处在东方国家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之下,这主要是通过色雷斯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

①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5页。

② Werner Jaeger, *The Theology of the Early Greek Philosoph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7, p. 18.

两个渠道输入的。因此,希腊的民族性格在起初就受到了东方精神的影响,而希腊的宗教也只能在这样一种假设上来理解,即外国的礼仪和宗教观念被添加在希腊古代的风俗习惯之中。这些被移植过来的神,如狄奥尼索斯、西布莉、腓尼基的大力神等可以在起源上证明他们是外来的。

然而,正如策勒尔所质疑的,如果我们要谈论希腊哲学所受到的东方影响,我们就必须只能考虑那些直接对希腊哲学产生影响的教义或思想,而不能考虑那些通过希腊早期宗教或希腊人的性格发展而间接对希腊哲学产生影响的教义或思想。只有当哲学并不起源于希腊的文明和精神生活,而只是从外国移植而来时,我们才能说希腊哲学完全来自于东方。但是,如果哲学是希腊哲学家们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时,它就有了自己的起源,而存在的问题也就不是古希腊哲学是否来自于东方,而是东方的教义或思想是否与古希腊哲学有相同之处。这种外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少,我们能够在希腊哲学中找到多少这种东方的因素以区别于希腊的因素。策勒尔认为,有两个问题在学界没有被认真地区别对待。这就是,外国的影响是直接进入希腊哲学还是通过希腊宗教的媒介。这两个方式非常不同,而正是前者才是我们所应关注的对象。

策勒尔指出,有些主张希腊哲学源自东方的人,或用一些古人的话,抑或通过希腊和东方思想的内在相似之处来支持他们的观点。第一种方式很显然不具有可信性,而对于第二种方式而言,虽然新毕达哥拉斯和新柏拉图学派的信徒们认为泰勒斯、费雷西底、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的思想受益于埃及僧侣、卡尔迪亚人、古代波斯的祭司甚至婆罗门教教义,但这种证据只有当我们确信它基于一种可信的能够追溯到这些哲学家自己的经历之中时才是有效的。可是谁能保证他能够有如此的确信呢?因此,对于这种思想关联的考察,应当怀有一种谨慎的历史态度。如果哲学家自身并没有讲过自己受到某人或某个学派的影响,我们就不应当有这种武断的假定。泰勒斯可能到过埃及(但我们对此也没有确信的证据),但是他也只可能在那里学到些初级的数学理论。伊索克拉底说,毕达哥拉斯访问过埃及,而他的整个哲学就从那里发源,这种说法更像是一种修辞性的虚构。希罗多德从来没有说过毕达哥拉斯去过埃及,只不过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很多教义和风俗。柏拉图在埃及的经历看上去是真实而具有历史性的。然